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总第1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主 编 任 平
副主编 曹典顺 李惠斌

2012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

唯物史观与思想方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与问题

新现实主义与中国

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新思考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主办：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主 编 任 平
副主编 曹典顺 李惠斌

【总第1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2) / 任平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17-1505-0

I. ①当…

II. ①任…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732 号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2)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6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357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 军 梁 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学术委员会主任：衣俊卿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丰子义 王南湜 孙正聿 刘森林 刘陆鹏

张一兵 杨 耕 陈 忠 杨金海 汪信砚

吴晓明 李景源 欧阳康 俞吾金 郝立新

主 编：任 平

副 主 编：曹典顺 李惠斌

编 委 会：任 平 曹典顺 李惠斌 吴忠海 冯建华 孔明安 于桂凤

本期执行编辑：冯建华 于桂凤

主办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 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于2011年10月，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在地方设立的第一个研究基地学术机构。中心研究人员立足于发展哲学、文化哲学、全球化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学术影响。中心现设有两个研究所：资本与现代性研究所和当代发展理论研究所，今后将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心目前拥有一支由学术造诣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现有理论建设工程专家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3人，博士生导师8人，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培养人才2人。中心名誉主任为衣俊卿教授，主任为任平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将依托研究中心联合培养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范式创新研究中心

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简称范式中心）成立于 2011 年，现有校内外研究人员 20 余人，中心名誉主任为任平教授，主任为曹典顺教授。

范式中心是由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校长任平教授指导创建的。依托任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研究中心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深入研究与创新为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展开资料收集和学术研究工作。目前，研究中心已经收集了全国 27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相关导师的著作 3000 余册，论文近万篇，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资料库。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心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问题，对各类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展开了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在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发挥着自已的作用。

范式中心，一方面立足于已有基础，继续发挥既有特色优势，争取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心”；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与视野，更新研究方法与观念，加强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争取成长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交流中心”。

发刊词

努力深描创新时代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

任 平

在衣俊卿教授的关心支持下，由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双方共同编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终于问世，我希望她真正能够成为同步、同态、同构地记录、反映和表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前沿之声，真正成为中心与全国 20 多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分享理论创新发展经验的交流互动平台，真正成为共同创造和完善研究范式、积极评价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见解的学术基地。作为主编，在本论集出版之际，我应当深切地感谢中央编译局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感谢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者的通力合作，感谢广大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

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前沿是一件意义深远而又难度颇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思想解放和创新发展中在不断推出重大观念创新的同时，就在日益形成和完善着某些理论创新的思维工具——研究范式、主要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哲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哲学对话、“反思的问题学”分析、各分支领域（部门）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代形态理解和出场学等八种形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学术史需要对人物、著作、事件、关系等作历史描述，但是更需要作内在的本真性结构的阐释。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哲学见

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马克思曾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204页）范式就是理论创新的思维劳动工具，因而也可以是理论创新中形成的、专属于某种创新路径的主要标识，更是理论创新程度和创新时代的标识。对这一标识进行系统研究，需要有专门的学术阵地。本论集就是这样的阵地。20多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学术重镇，虽然也在探索研究范式中不断实现“方法论自觉”，但是就全国而言，缺乏一个从总体上反思和研究各种创新研究范式、进而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这一缺失使各个博士点创新探索增添了盲目性，缺少自觉反思机制和在各个博士点之间经验分享机制，更没有对各个范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有效分析和协同推进的整合机制。有鉴于此，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的建立，其宗旨就在于填补这一空白，期望在广泛收集各个博士点创新成果、建立相关数据库的基础上，保持与各个博士点的密切互动关系，能够再现其理论创新的过程，反思其成功经验和受挫的教训，仔细辨识各个范式的学术特点和创新功能，也同时将范式关系做一个扩展的学术史坐标和总体图谱的把握。每一个时代的范式的地位是不同的。由轴心范式而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坐标扩展而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史图景。图景之间的转换，就构成了范式图谱。由于各种范式视域差异，因而推动理论创新的功能各不相同。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共同构成范式图谱，因而总体展现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构变。科学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以及与国内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风格甚至学派的关联，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元创新的整体学术史的主要基础，也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扩大创新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本论集与全国各博士点合作，由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

究中心共同编辑，每年推出一辑，其中有相关博士点研究前沿的综述，有各个研究范式的专题研究报告，有对前沿学术动态的评论，更有相关专访专论。虽然论集如破土苗芽略显稚嫩，但是我相信，有大家的共同关心、呵护和支持，有编辑的精心策划和编校，论集必将“知识培养转深沉”，逐渐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是为序。

任 平

2012年9月19日于

徐州山麓东院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 创新与转换

任 平

伟大的时代总是催生思想的创新，使真正的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改革开放以来，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所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左”的教条思想樊笼，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内容和形态的创新，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过去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视域、多种方法、多样范式，先后呈现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方思想对话、反思问题学分析、各分支领域（部门）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解、出场学等多种形式，初步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大繁荣、大发展的良好学术态势。本文所指的“范式”，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探索所自觉使用的方式、路径和方法论。科学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图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对于与时俱进地推动理论创新、指导创新实践，扩大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批准号：10AZX001）的中期成果。

一、教科书改革与原理研究范式：普及与创新

教科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在场的主要方式。建国以来,“教科书热”大致出现在三个时段:一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为体现毛泽东思想,在教育部精心组织下,全国先后编出六种教科书草案,最后由艾思奇主编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建国后开启“教科书中国化”时代的第一经典。第二是教科书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努力表达改革的精神,以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标志,开创教科书改革路径的先河。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全国出版了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约712种,发行量累计突破1.2亿册,其中包括陶德麟、赵光武、辛敬良等著名学者主编的教材。第三是教科书改革进入创新时代。从2004年开始,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重要内容,由首席专家袁贵仁、杨春贵、李景源为主编,集体编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10)。新时期,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成为我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成为培养和造就几乎所有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摇篮。深度描画教科书改革的历史图景,我们的追问旨在以下几点:第一,这一范式出场的深层原因;第二,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和创新成就;第三,这一范式的内在问题和基本出路。

教科书改革范式之所以出场,旨在打破苏联和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用日益僵化和教条化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要求用解放思想、改革精神重写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方式的教科书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原初阐释思想的文本,虽然包括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原理》等直接面向工人大众的普及性读本,但并没有采取“教科书”方式。作为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积极批判”杜林的机会,对“共产主义世界观”作“系统而比较连贯的阐述”。其中“哲学篇”初具原理的雏形。此后,狄慈根、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梅林等

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了进一步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分别撰写了类似“教科书”的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拉布里奥拉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真正将之变成教科书的是苏联。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唯物主义历史观》（1901），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都为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列宁甚至称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也曾经在过渡时期成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的普及读物。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巩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统一国家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必要以教科书“标准”话语、完整体系方式阐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批判德波林为契机，斯大林撰写《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苏联学者出版了最早版本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32），《辩证唯物主义》（1934）。1933年底，全苏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校哲学教科书，标志着教科书话语体系范式的形成。由于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延安时期的授课大纲，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早期雏形。解放初期，由于政治战略“一边倒”的需要，我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规模培养马列师资，请苏联一批专家讲学，因此苏联教科书思想就从此通过中国知识界途径向整个社会普及。学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教科书，如《联共（布）党史》（包括其论述哲学的四章二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上下编），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在人民大众中普及“苏联教科书”的同时，就将苏联教条解释深深嵌入中国读者心灵，成为长期禁锢思想的框架。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有所警惕，反对无条件作思想地理平移，要求“教科书中国化”，体现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拉

开了教科书中国化的序幕。这体现了那一时代中国化研究水平。教科书化对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一个基本结论是:只要我们还希望教科书承担不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主导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功能,那么,“去教科书化”就是不可行的。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时代的烙印。

教科书改革的动力来自三个因素。第一,重写新的时代精神。以往教科书都是革命年代及其延伸的思维产物,反映“以阶级斗争为纲”主题,成为“革命的逻辑”,与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改革、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脱节,因此需要解放思想、促使教科书理论旨趣的大转换。以“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等振聋发聩口号为指引,以“时代精神与哲学改革”为主线,编写出反映改革、发展的时代精神内容的哲学教科书,就成为学界的主要目标。肖前、李秀林、汪永祥的文本就是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第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标准体系。教科书改革,则成为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以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主体—客体”关系为主线,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拉开教科书体系变革序幕的标志。此后,在1988年开端、20世纪90年代渐入高潮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推动下,陆续推出了肖前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辛敬良的《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等新文本。第三,重建学科体系。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新时期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学科建设成为高校知识生产的龙头,能否建立一种与研究生培养结合的知识生产体系、教学体系,就成为衡量学科水平高低的标志。因此,重写教科书,就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出版的大约712余种教科书中,涉及概念变革和个别原理创新的有30余种,体系变革的有17种,其他都是大同小异。这些都成为全国各大中院校、研究单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材,而根据教科书而实施教育的哲学课程成为普及的主阵地。



教科书话语体系的教条化和僵化，其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把历史的思想非历史化、相对的结论绝对化、创新理论教条化，从而疏离时代、脱离实践、脱域国情。所谓“历史思想非历史性”，就是教科书显现的“原理”是理论空间结构，与思想的历史性（“每个原理都有它出现的世纪”）之间存在矛盾，思想不断出场的历史图景、变化和发展性被原理严重遮蔽，把原初属于不断出场、基于“历史的科学”变成了相对凝固、脱域和永恒在场的“历史哲学”，从而重新走向马克思哲学革命始终反对的“在场形而上学”即僵化和形而上学。所谓绝对化，即排除差异性理解的同一性构型。教科书要求标准地表述“基本原理”，入编的只能是理论界得到普遍共认的一般观点，即“定见”和“成熟”观点，遵守同一律、排除歧见，按照同一性准确表述原理，是教科书编写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是教科书与研究性专著最大的差别之一。正因为如此，它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在众多差异性理解中，哪种理解能构成“基本原理”？这一理解一旦形成，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元论需要，倾向于理解的“固化”，很容易窒息任何创新冲动，最后必然走向僵化。所谓教条化，指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学者编写的教科书，都有一种企图：就是利用教科书而造就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绝对真理体系。表述逻辑框架的完整化、一贯性的体系哲学更凸显了这一教条化倾向。

因此，教科书范式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存在着先天缺陷。主要是教科书阐释的原理性与历史性的矛盾，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个体理解和普遍认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相对中的绝对”使教科书永远需要不断出场——不断随着时代变化和空间差异而修订改变，对“基本原理”的追问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一切所谓原理都有出现的世纪，一切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对经典作家文本的引证也是如此。为了证明某个原理的正确性，教科书不得不经常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话语都平行地、非历史性地加以引证，而往往创始人的思想前后是发生很大变化的。这一“非法引证”显示出教科书范式原理性阐述所特有的尴尬。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特性直接导致思想僵化。突破这一教条，就是要从历史、从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

发展、变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场过程,恢复马克思摒弃一切在场形而上学的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考察:历史维度与创新话语

教科书范式非历史地引经据典,将不断出场、与时俱进的“历史的科学”变成一种绝对在场、永恒在场的形态,从而导致教条化和僵化,引起了理论界的批判反思。一是为恢复“历史性”的追求,二是与西方“马克思学”中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本真意义,是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学科范式兴起的两大动因。

中国马哲史范式生成与转换,经历了两度转变、三个阶段。^① 初创阶段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为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一批学者编写了教学大纲。1978年,中山大学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等人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庄福龄等人为副主编,承接了教育部第一个马哲史教材编写计划。^② 在1979年成立全国马哲史学会基础上,20余所高校集体编撰的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初创阶段结束、转向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发展阶段的特点之一是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以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庄福岭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纲要》(1983)、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黄楠森主编的一卷本、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孙伯鍈的《走进马克思》、余源培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等的问世,学者对马哲史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方法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界定,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形成。第二个特点是通史与专题研究结合,出版了一批回应西方“马克思学”、深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

^① 张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② 徐俊忠:《面对先师仅有感恩是不够的——在刘嵘、高齐云、叶汝贤教授学术贡献研讨会上的发言》,《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哲学本真意义的路径。世纪之交开始的第三阶段，为方法论自觉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不仅是人才辈出（中年学者代表如张一兵、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丰子义、王东、王金福等，更为年轻一代如唐正东、聂锦芳、胡大平、张亮等人也崭露头角）、成果卓著，而更重要的是学界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将重读马哲史成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的方法论，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语境大为改观。MEGA2 的传入，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陆续出版，为在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哲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对外交流更加深入，与境外研究机构建立和稳定的学术联系，不仅有更深入的学术成果交流，更有研究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着眼于与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对话，深化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主题的专题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①

以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为标志，作为一种范式的马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阐释的历史性。马哲史脱胎于“原著选读”，但马哲史范式转换的内在革命性在于：原著选读目的在于“证明”教科书原理出场有据，作为原理教科书的从属物，它们注重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而后者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历史视域，在历史场域中阐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第二，创新理解。马哲史不仅是对“史”的深描，更是对“论”的阐释，是通过“史”的眼光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苏联僵化教条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进而对实践做新的理论穿透。第三，实践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和整合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出场不再是一个单纯封闭的哲学自我革命的产物，而是被还原到“改变世界”与“理解世界”相互激发。一个在古典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历史学说相互影响条件下的整体碰撞的结果。

^① 庄福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光明日报》2000年2月29日。

当然,按照时间逻辑还是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马哲史,一直是问题之一。列宁曾经借助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解读而反对将哲学史变成“人名和书名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内在逻辑的演进史。问题之二是马哲史始终存在着解释学循环:方法论视域与对象本性的循环,微观文本解读与整体通史阐释的循环。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仅是思想出场史的深度描述是不够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马哲史,有一点可以肯定:思想史的出场背后是真实历史的存在。思想终止的地方,才是真正历史的开始。而思想史不过是真实历史出场的思想表达,前者对真实历史语境有很深的依赖性。因此,穿越思想史而到达其背后的历史语境,用历史语境来规约思想史的逻辑,这就必然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而走向出场学。

三、文本文献学考察:“回到马克思” 原初语境的解读方式

历史的视域需要有文本文献学考订研究论据的支持才是可信和有效的。以1999年张一兵的著作《回到马克思》作为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主要标志,其出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背景。

第一,打破教科书和原理研究长期非历史地援引经典作家话语而教条化僵化理解方式,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质,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正如张一兵所说:这一解读模式就是要还历史的马克思本真面貌和原初语境。“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①与马哲史相比,启封文本解读范式,将更加注重文本深度耕耘和意义探索,更加关注文本结构、作者心灵、思路的意义,更加注重从客观解释学“向前进”到“思想构境”的挖掘。

第二,文本文献学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本文献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见任平、陈忠主编:《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页。